

日本古鈔本
與五山版漢籍
研究論叢

劉玉才 潘建國 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劉玉才 潘建國／主編

日本古鈔本
與五山版漢籍
研究論叢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 / 劉玉才, 潘建國主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301-25837-8

I . ①日… II . ①劉… ②潘… III . ①漢學—研究—文集 IV . ①K207.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101954 號

- | | |
|-------|---|
| 書 名 | 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 |
| 著作責任者 | 劉玉才 潘建國 主編 |
| 統 籌 |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東亞漢籍研究工作坊” |
| 責任編輯 | 武 芳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301-25837-8 |
| 出版發行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
| 網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電子信箱 | dianjiwenhua@163.com |
| 電 話 |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經 銷 者 | 新華書店 |
|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開本 22.25 印張 2 插頁 362 千字 |
|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價 | 56.00 圓 |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部聯繫, 電話: 010-62756370

序論：日本古鈔本及五山版漢籍 對於中國文獻學研究的意義

劉玉才

兩漢以降，中國即成為向周邊地區輻射的文化源地，東亞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東南亞的越南等地，全面受容中國文化，形成以漢字、儒教、中國式律令、科技、中國化佛教為基本要素的漢字文化圈。在漢字文化圈內，書籍傳播成為重要的交流形式。特別是在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之間，相當於存在一條書籍之路。根據史書記載，早在兩漢之際，《詩經》《論語》等中國經典就流入朝鮮半島，並輾轉傳入日本。隋唐時期，日本列島諸國屢有遣隋使、遣唐使遠渡中國，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購求書籍。官方使臣之外，入唐求法的留學僧侶也攜回大量書籍。兩宋以降，日本使臣、僧侶購求書籍的事例，仍不絕於書。特別是僧侶的往還，促進了大量佛教典籍的東傳。由於雕版印刷術的流行，書籍不但數量巨增，而且變身為商品，因此商船載運也成為中國典籍外傳的重要形式。尤其在明清時期，書籍是中日貿易的大宗貨物，日本海關記錄的《舶載書目》可為例證。根據目前的調查，日本公私收藏的唐寫本，如果不計敦煌卷子，數量遠超過中國的收藏。日本所藏宋元刻本有一千餘部，接近中國現存總數的三分之一。

域外流傳漢籍的研究價值，首先在於提供中國業已失傳的佚書佚文，補充不傳之版本。在域外漢籍中，有相當部分中國已經失傳，版本系統不同或有內容殘缺。此外，中國典籍流傳至周邊地區，除原本得以存藏之外，通常再以傳抄、翻刻的形式擴大輻射面，衍生出和本、高麗本（朝鮮本）、安南本；其後又以注疏、諺解、選編、評點、翻案等形式融入各民族文化元素；然後接受中國文化薰陶的域外文人又仿作或創作出本土漢文著作。因此，漢籍的流傳，無疑極大地促進了東亞地區文化的交融與發展。

在漢籍域外流傳方面，日本以保存數量衆多、衍生品種豐富而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尤以古鈔本和五山版漢籍最具研究意義。日本傳存漢籍古鈔本的數量，按阿部隆一《本邦漢籍古寫本類所在略目錄》的標準統計，即有近千部，其中不乏底本來源於唐鈔本的嚴格意義古鈔本。如日本古鈔本《論語》，以魏何晏《論語集解》影響最廣，曾長期作為課本流傳。梁皇侃《論語義疏》，中國早在南宋即已佚失，卻長期在日本民間傳鈔，雖然古本原貌不存，但是影響亦非常之大，清乾隆時自日本引回，並編入《四庫全書》。根據現存資料記載，日本鎌倉時代（12世紀末—1333），清原、中原家分別有《論語》鈔本傳授，南北朝時代（1336—1392），清原家較中原家隆盛，中原家的鈔本漸趨式微。當時的讀者群主要是寺廟僧侶，他們廣事傳抄，形成衆多鈔本。根據初步統計，日本現存室町時代（1392—1573）《論語集解》鈔本即近百部。進入17世紀，隨着新的印刷技術興起，鈔本的主流位置方讓位給刻本與活字本。漢籍的傳抄過程，同時又是接納吸收的過程，日本人不僅通過訓點、批注加入自己的閱讀理解，還進行摘編改纂，衍生出新的漢籍文獻品種。在這些日本人編纂的漢籍文獻中，不僅保存了源於中國的古本面貌，中國不存的佚書佚文，還反映出日本社會當時的文化旨趣。如日本平安時代中期大江維時（888—963）編纂了唐詩佳句選集《千載佳句》。大江家族世代傳承漢學，與皇室關係密切，尤其對白居易詩作有深入的研究。因此，《千載佳句》不僅為唐詩研究保存珍貴文本資料，還反映出唐末文人及平安時代中期日本文人的詩歌審美傾向，具有多方面的價值。^① 雕版印刷興起之後，日本漢籍古鈔本仍流傳不輟，有些鈔本雖以刊本為底本，但其依據的宋元刊本多有不傳者，文獻價值亦不可小覷。

日本早期雕版印刷，以刊刻佛籍為主，有“春日版”“泉涌寺版”“高野版”等名號，多是基於宋版和高麗版藏經上板，預示著寫本到刻本的代興。13世紀中後期，日本效法宋代“五山”名號，在政治中心鎌倉定建長寺等五寺為“鎌倉五山”；14世紀中期，又在京都定天龍寺等五寺為“京都五山”，從此進入依託五山十剎、崇尚禪宗的五山文化時期。五山僧侶傾情漢文化，並發展出獨具特色的“五山漢文學”，為學習的需要，覆刻漢籍的事業便在五山十剎興盛起來。廣義的五山版漢籍，即是指五山以及禪宗相關者在鎌倉、室町時期刊行的典籍。五山版漢籍雖仍以佛籍為主，但適

^① 劉玉才、張一南，《〈千載佳句〉校讀芻議》，中華書局《文史》，2007年第3期。

應禪僧學詩作文的需要，也刊刻了不少外典。根據川瀨一馬《五山版の研究》調查，今殘存五山版總數一千數百部，估計開版約有三百餘種。其中外典七十九種，包括不同版本十七種。^① 內容主要是覆刻中國典籍，少量日本國書和中土渡海僧語錄。五山版漢籍外典包括傳統經典、詩文集及作詩參考用韻書、簡明歷史類書和入門讀物，其底本部分源自日本古鈔，如《正平板論語集解》《古文尚書》《毛詩鄭箋》；部分源自宋元刊本、朝鮮刊本以至明刊本，如《春秋經傳集解》《音注孟子》即以新渡的覆宋刊本為底本，在南北朝時期刊行。室町中期以後，還加進少量覆明刊本醫書。從數量來看，五山版漢籍外典大半為覆元刊本，其次是覆明刊本，往往直接以新舶入的漢籍覆刊。江戶以降，慶長古活字版、江戶刊本漸次興起，五山版遂退出日本出版史舞台。

五山版漢籍的中國文獻學意義，首先自然在於保存佚籍佚本。如宋末于濟、蔡正孫編，朝鮮徐居正等增注的《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融詩格、選本及評點於一體，是研究宋元之際詩學發展的重要文獻，且保存了約四百首宋人佚詩。^② 此書在中土元代之後失傳，幸賴有五山版覆元刊本，尚保存其文本面貌。宋周弼選，元釋圓至注，元裴庾增注的《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保存之裴庾增注，中土久佚。唐柳宗元撰，宋魏仲舉編《新刊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引南宋史學家蔡夢弼注兩百餘條，為通行百家注本所無。^③ 《春秋經傳集解》覆刊國內無存的宋興國軍學本，其所據底本，楊守敬認為“今世所存宋本《左傳》，無有善於此者”。^④ 其次，五山版漢籍保存了豐富的中土版刻信息。五山版刻意效仿中土版式書風，刊刻精良者幾乎與原據底本難辨雌雄，逼真地表達了原本的風貌，在原本失傳的情況下，可以起到替代作用。五山版甚至可以作為標準器，鑒別館藏為中土原刻還是日本覆刊。衆所周知，元明之際還有部分刻工流散到日本，並在現存五山版漢籍中留下了他們的名字和籍貫，成為珍貴的出版史料。而五山版忠實覆刊原本的刻工姓名，還可復原部分宋元本殘缺的刻工資料。五山版漢籍還保存有豐富的刊記，據川瀨一馬統計當在一百四十種左右，其中不乏所據底本的刊記，這對於考察中日版刻源流都具有

① 川瀨一馬，《五山版漢籍の研究》，東京：日本古書籍商協會，1970，4頁。

② 卞東波，《唐宋千家聯珠詩格校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③ 羅凡，《域外漢籍刊布與研究的重大進展——〈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述評》，《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7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④ 楊守敬跋語，見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五山版《春秋經傳集解》卷尾。

重要意義。再次，我們考察五山版漢籍的中國文獻學意義，還應置於東亞漢籍交流的宏闊背景之下。五山版漢籍的底本無論源自宋元刊本、日本古鈔本還是朝鮮本，本身都具有自己流傳的軌跡，甚至附著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而覆刊之後，更是參與到異文化的塑造之中。試以《寒山子詩集》為例，其宋元刻本，中土已大多不傳，甚至刊刻信息亦不見於歷代公私書目著錄，幸賴日本、朝鮮的收藏與翻刻，方為我們保留下了宋國清寺本、東皋寺本、無我慧身本、江東漕司本、寶祐本，元元貞本、大德本，明正德本，以及日本、朝鮮覆刻宋元本的記載，這對於寒山詩集的成書與文本研究具有非凡價值。^① 而更加重要的意義則在於透過這樣一部小書的流通，可以看出東亞諸國之間書籍的交流，雕版印刷技術的互動，進而思考東亞文明的大課題。

日本近代有關漢籍古鈔本問題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明治時期，已經形成基本穩定的學術範圍，涉及日本書志學、國語國文學等研究領域，主要關注古鈔本的傳承、書風、字形、紙張、題識、背書、遞藏信息等項內容，成果相當豐富，近年亦有學者關注文本受容研究，揭示其漢籍輯佚價值。但總體而言，對於文本的關注有所欠缺，尤其是在與中國古寫本、刊本的關聯研究方面，存在較大開拓空間。五山版漢籍研究方面，日本川瀨一馬、椎名宏雄等學者無疑貢獻卓越，有關存藏調查和著錄相當完備，但似乎主要局限於漢籍書志學範圍，對於文本內容，不如日本國書重視。反觀中國學者，自近代楊守敬為代表的日本訪書以降，更為注重挖掘唐鈔宋槧，對於日本古鈔古刻，則抱持佚存心態，此點從楊守敬《古逸叢書》到新近出版的金程宇編《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概莫例外。因此，中國學界對於日本古鈔本和五山版漢籍的研究，除了所謂的佚存書之外，往往僅視其為中國典籍的翻本，內容無足輕重，關注熱度不高。當然，近年我們也看到了可喜的學術進展，對於東亞漢籍的關注，已有從宋元版、佚存書轉向域外傳抄、刊刻本，甚至域外文人漢籍作品的趨勢，並將其置於漢文化整體研究、亞洲漢文學研究、東亞文化交流的宏闊背景之下。我們相信，隨著《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之類文獻的編纂出版，必將推進東亞漢籍研究走向深入。

北京大學有關注東亞漢籍和國際漢學的傳統，北大圖書館擁有自李

① 劉玉才，《〈寒山子詩集〉早期刊本源流鉤沉》，《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2012年第6期。

盛鐸、楊守敬集聚起的珍貴東亞漢籍收藏，其中館藏日本古鈔本、五山版及和刻本、朝鮮本數量，在國內名列前茅，最近又有日本大倉文庫漢籍的整體入藏，為開展東亞漢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獻基礎。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成立之後，在國家漢辦的大力支持下，致力於創辦國際漢學研究的研究基地和資料基地，並將東亞漢籍的整理研究列入重要課題。筆者早前在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已與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高橋智教授合作開展日本《論語》古鈔本的綜合研究，取得初步成果。目前，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東亞漢籍研究工作坊”又與斯道文庫住吉朋彥教授主持的五山版研究會合作，共同開展五山版漢籍的影印出版與研究工作。為了推動東亞漢籍研究的深入開展，2014年3月15—16日，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北京大學中文系與北京大學出版社聯合主辦了以日本古鈔本及五山版漢籍為中心的東亞漢籍國際學術討論會，中日二十餘位學者應邀與會發表論文。本論叢即以此次會議論文為基礎加工完善而成。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東亞漢籍研究工作坊”希望今後繼續為海內外研究者搭建切磋交流的平台，共同推動東亞漢籍在既有研究基礎上，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和方向。

目 錄

序論：

- 日本古鈔本及五山版漢籍對於中國文獻學研究的意義 劉玉才 / 1
- 鎌倉與京都
- 以日藏舊鈔本之文本異同爲中心 静永健 撰 陳昶 譯 / 1
- 内野皎亭本《尚書》和有關的幾個問題 李 慶 / 10
- 關於舊鈔本金澤文庫本《春秋經傳集解》 佐藤道生 撰 陳小遠 譯 / 29
- 日本宮内廳藏九條本《文選》研究 傅 剛 / 34
- 《文鏡秘府論》注釋考(一) 盧盛江 / 67
- 李嶠《雜詠》會校 陳尚君 / 77
- 唐皇族詩人李範新探
- 《千載佳句》所收李範五聯詩句考論 劉 潔 / 98
- 宮内廳書陵部藏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漢字研究 王曉平 / 115
- 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之鈔寫時期考
- 以《玉海》東漸爲綫索 陳 昶 / 133
- 崑崙與獅子
- 《祇洹寺圖經》劄記 黑田彰 撰 李銘敬 蔣雲斗 譯 / 146
- 《唐大和上東征傳》古鈔本劄記 王 勇 / 180
- 身延文庫藏《弘決外典鈔》古鈔本初探 河野貴美子 / 199
- 五山版《三註》考 住吉朋彦 撰 杜軼文 譯 陳捷 審訂 / 218
- 五山版《寒山詩》版本價值測議 辛德勇 / 238
- 關於五山版漢籍《廬山外集》
- 兼證北大藏本非元刻本 潘建國 / 264
- 周弼《唐詩三體家法》中日版本流傳考述
- 以元刊本和日本“五山版”爲中心 杜曉勤 / 283
- 龍谷大學藏元郭居敬《百香詩選》續考 金文京 / 300

2 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

汲古書院和刻《晉書・載記》序論及漢趙部校證

——五胡十六國霸史基礎文獻研究之一

童 嶺 / 306

傅增湘與避暑山莊

——從日記、詩篇及照片進行考察

稻畑耕一郎 / 328

鎌倉與京都

——以日藏舊鈔本之文本異同為中心

静永健 撰

陳 翀 譯

首先，請允許我借花獻佛，對於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舉辦此次意義重大的“東亞漢籍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表示衷心的祝賀！也對為籌辦這次大會付出辛勞的籌備委員會的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接下來，我想就這三十年來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日本舊鈔本之文獻價值，以及其研究方法上所注意到的一些基礎事項，做一些簡單的介紹。拋磚引玉，以求得在座各位先生的指教。

大家都知道，舊鈔本是日本特有的一種珍貴的文獻資料。然而，對於“舊鈔本”這一術語，學界過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並未予以明確的定義，因此在使用上有些混亂。最近，日本學界對於這一用語做出了如下之規定：

所謂舊鈔本，就是手寫的古寫本，其書寫時期大致應以奈良期（8世紀）至室町期（16世紀）為限。這些卷子雖然鈔於日本本土，但其本文直接來源於由唐時遣唐使等帶回的唐鈔本。^①

作者單位：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

譯者單位：日本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① 參見神鷹德治，《序論——舊鈔本と唐鈔本》，神鷹德治、静永健主編，《舊鈔本の世界—漢籍受容のタイムカプセル》，《アジア遊学》總 140 號，東京：勉誠出版，2011 年 4 月，4—11 頁。



圖 1



圖 2

這一定義是由日本明治大學的神鷹德治教授所界定的。在這裏我還想特別補充一點的是，研究舊鈔本不能為其書寫時間所局限，更需對其所鈔文本究竟源自於中國的哪一時間段做一些必要的考證。譬如，圖 1 與下圖 2 所錄白樂天《琵琶引》寫本，據卷末奧書可知其鈔寫時間為“貞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貞和五年”相當於元朝最後一位皇帝惠宗元順帝至元九年，也就是公元 1349 年。然而，這個鈔卷的本文卻非出自宋刊本，而一般被認為比較忠實地保存了更早時期的白居易唐鈔舊貌。要之，在研究舊鈔本時，首先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舊鈔本的鈔寫時間及其本文成立之時間，往往與同時代的刊本譜系並不一致。因此，日本所藏的舊鈔本，經常能夠為中國古籍文獻之研究提供許多重要的信息。換句話說，在研究其所鈔本文之時，不應根據其鈔寫年代就草率地將其視為之前某一刊本的轉鈔，而應該先將其與宋刊乃至明刊本進行一個仔細的文字對校，釐清此鈔本之底本究竟屬於哪一時期的文本、其底本又究竟是於何時傳入日

本等文獻考證上的根源性問題。這一工作，雖然枯燥繁重但必不可缺，也可以說是舊鈔本研究的出發點。

其次，還要引起我們關注的是舊鈔本所包含的豐富的信息量。大家都知道，舊鈔本是由日本古人所鈔寫而成的一種特殊的文獻資料，如翻閱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就不難發現，其本文之外往往還包含了彼時所寫入的諸多訓注符號。可以說，大部分舊鈔本，都會標注上用片假名來顯示讀音的“送假名”和用符號來顯示原文之語法結構的“訓點”，以及用圈點來表示原文聲調（平上入去）的“聲點”等各種本文之外的信息。在此基礎上，有些鈔本還會寫入持卷人據他本多次校讀時所注意到的一些文字異同。而以上這些信息，不只是日本語史及訓讀史研究時的重要資料，對於中國文學之文本解讀其實也大有裨益。因此，希望今後有機會能儘快將這批貴重的資料公諸於世，以資全世界的中國學學者研究。當然，包含了如此細微繁雜信息的舊鈔本，單對電腦之圖像瀏覽肯定是無法迅速獲取其全部的細節信息。因此，研究舊鈔本時，也不能過分依賴通過電腦檢索所獲取的信息（當然，我並無否定電腦檢索之簡捷功能的意圖）。在得到了高清圖版之後，更應花時間反復對圖版進行仔細的分析與確認。只有這樣，才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舊鈔本中獲得有益於自己研究的重要信息。而包括我在內的日本方面的學者，也應不斷請求藏有這些珍貴鈔本的寺廟、神社及各大學術機構，儘可能向全世界的學者提供這些鈔本的高清彩色圖片。

言歸正傳，就舊鈔本圖版公開的現狀而言，管見之內，確實還很難稱得上滿意。而且，即使是已經出版了的一些影印本，其出版年代也要上溯到十幾年前。由於當時之出版技術的限制，這些黑白複印本，很難說如實地再現出了原鈔卷的全貌。而這也正是應該引起相關學者在使用複印本進行研究時的注意的第三點。茲舉二例對此予以說明。

我曾有機會對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卷八原本進行調查，發現原本的“遙”字之旁，竟還有影印本中沒有顯示的一行朱筆小注（參見圖3圈點處）。這行小注，他本雖均未見有，但基本可以推測為現已散逸了的白居易自注。另外，除如圖3所示舊鈔本經常使用朱筆來補入鈔寫時所漏寫的文字之外，有些鈔本還會使用多種顏色的文字甚至角筆，來記錄其對所見不同版本的校勘結果。這些重要的信息，如果沒有接受過一定的學術訓練的話，即使是高清圖片也很容易會被忽視。而在過去的黑白影印本中，很遺憾，更是往往因為技術問題而乾脆被予以了屏蔽。因此，我們決

不可以將影印本、特別是黑白影印本簡單地與原卷劃上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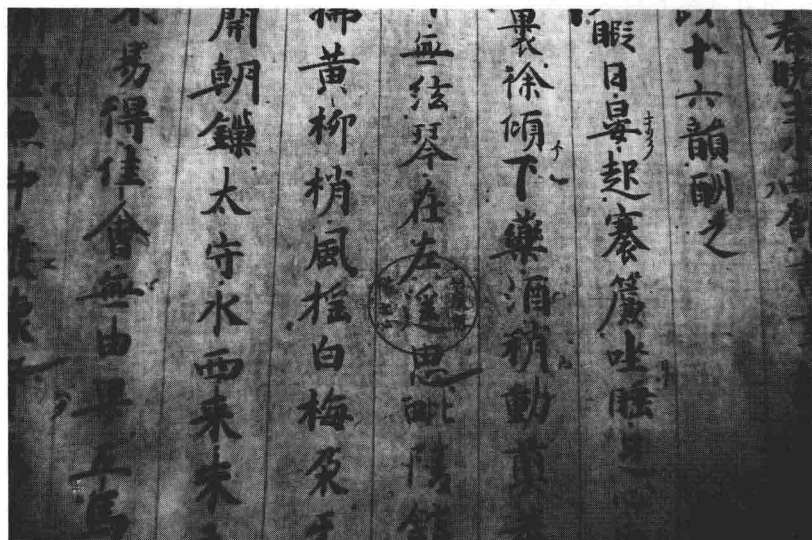


圖 3

於此讓我們再來看看圖 4-1 之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卷十四(與上卷八同藏於日本歷史民俗博物館)卷頭的一首詩。其本文一見可讀為：

翰林中送獨孤廿七起居罷職出院

碧落留雲住，青冥放鶴還。銀臺向南路，從此到人間。



圖 4-1



圖 4-2

這裏要引其我們注意的是末句第三字之“到”字。此字在以南宋紹興本爲代表的刊本系統本中均作“到”。然如圖 4-2 所示，如果對金澤本原本做一個較仔細的確認的話，就不難發現其本文“到”字之下，原來還寫有另一文字。這可以考慮爲現存本文中的“到”字，乃是鈔寫者後來根據多本校勘的結果所認定的一處文字，因此才會用一種白色的顏料將原字覆蓋，再在原文之上寫入這個“到”字。幸運的是，通過透光攝影及其他角度對原卷的目視，可以判斷出此處原來的文字是一個“別”字，且其左旁原還寫入了一個校勘文字之“到”字。如此一來，就不能排除此處白詩原文有是“銀臺向南路，從此別人間”的可能性。而“別”與“到”，文意恰好相反。

考此詩中所言及的獨孤二十七起居，乃唐代古文家獨孤及之次子獨孤郁。獨孤郁比白居易年輕四歲，與白居易一同應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及第。後因才能爲唐憲宗所評價而被提拔爲起居郎。根據兩《唐書》（《舊唐書》卷一六八、《新唐書》卷一六二）及韓愈墓誌銘之記載，獨孤郁在被提拔不久之後就因身患重病而辭出翰林院退隱郊居，僅僅數月之後，也就是元和十年正月，不幸於長安南郊鄠縣離開了人世。如結合這一史實，就不難推測出此詩乃白居易爲舊友辭去翰林院一職時所寫的一首送別詩。其惋惜之情，溢於言表。而新發現的這一“別”字，無疑要較通行諸本之“到”字，與詩題及全詩所詠退隱之主題更爲吻合。金澤本的這一塗抹文字的發現，爲我們提供了一條還原白詩真意的重要線索。至於金澤本之主人爲何要做如此校改，將在下文再予以言及。

如上所述，由於舊鈔本包含了極爲繁複瑣細的信息，在研究這些文本之時，往往需要研究者通過長期研究而積累下來獨特的經驗與視角。不過，如果掌握了一些基礎方法及意識，還是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去利用這些鈔本。最後，我想結合研究舊鈔本之中最爲基礎的奧書問題，來談談自己的一些淺見，以供大家參考。

請看下圖 5。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卷十四卷末，寫有如下之奧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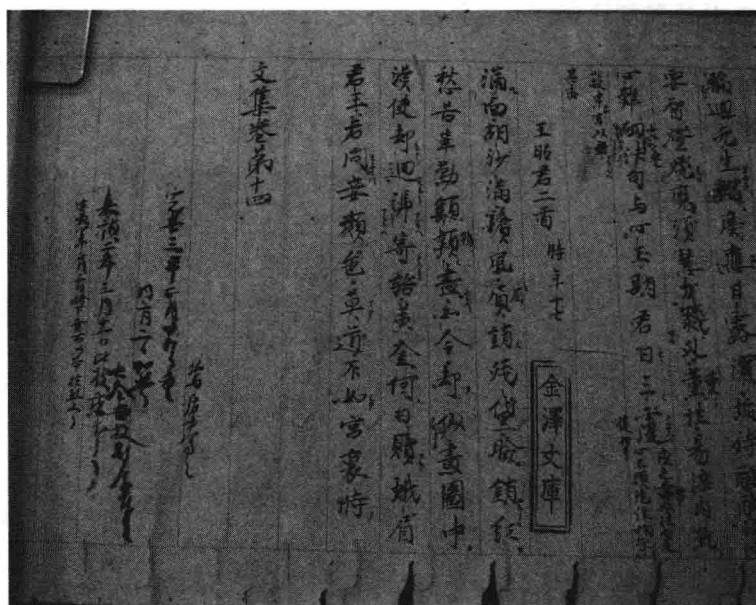


圖 5

- 寬喜三年正月廿九日書之 但馬房書寫之…………(1)
 同二月二日加點了 右金吾校尉原奉重
 嘉禎二年三月十一日比較唐本了 ……………(2)
 建長四年正月三日傳下貴所御本校點又了…………(3)

由上三則奧書可知，此鈔卷首先鈔寫於寬喜三年(1231)正月，之後又在原卷上加入了訓點。此時所用底本當是平安時代所傳入的唐鈔系統本《白氏文集》。之後的嘉禎二年(1236)，該本之主人又使用“唐本”對原鈔卷進行了校勘，且於建長四年(1252)又再次使用別本(按，即奧書中的“傳下貴所御本”，太田次男博士《旧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勉誠出版，1997年]推斷其為鳥羽天皇皇子冷泉宮賴仁親王[1201—1264]所藏本)進行了再校。這就是之前我談到的研究古鈔本時最為基礎的知識之一，也就是研究日本古鈔本之第四點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地方，即日本舊鈔本，往往記錄了其持有者經過長時間(如就卷十四而言，大致歷經二十餘年)使用他本對讀時所留下的校勘成果。

其實，現存之日本的古典籍，無論是和本還是漢籍，大都經過了非常仔細的本文校勘。然而其校勘經緯常常又因人而異，需要逐一確認。在

這裏特別要引起我們重視的是(2)中“唐本”一語。平安時代首先傳入日本的無疑是唐代寫本，這個系統的文本，主要在以天皇爲代表的京都貴族圈子中被保存下來，也就是本文題目中的“京都”。然而進入宋代、特別是南宋時期之後，武家勢力(平清盛、源賴朝)抬頭，隨着日宋貿易的繁榮，通過寧波＝博多航路，大量的刻本典籍也被傳入了日本，而這就是本文題目中所指的“鎌倉”。由此再來反觀(2)之嘉禎二年的校勘活動，或許正是因爲這次校勘，成爲當時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寫本(平安＝唐)與刊本(鎌倉＝南宋)之間存在差異的一個契機。因此，之後又接着繼續使用了他本進行了(3)之再次校勘。

於此再回到上面所談到的那首白詩文字異同的問題。對於這一文字的變遷，通過上述奧書的解讀，我們大致可以將其考校過程歸納於下：末句(1)之平安寫本本是“別人間”；(2)之宋刻本作“到人間”；(3)之別本亦作“到人間”。或許正是因爲第三次所見本爲“到”字，這一鈔卷的主人才在本來已經在原文旁注明“到”之文字異同的情況下，又用白色的顏料將原文字及小注之文字校勘予以塗抹，直接將本文改爲了“到”字。

接下來讓我們再來看看下面同爲金澤文庫本的《白氏文集》卷五十四，其卷末寫有如下之奧書：

貞永二年四月十九日書写了 右金吾校尉原奉重。……(1)

此卷書写之本欠之間、尋摺本書入之處、摺本又摺銷所々

多之故、或遺料紙、或付置輪畢。以證本重可令比較者也。

寬元五年正月三日借請菅大府卿爲長證本、移兩點。多散不審畢。……(2)

建長四年三月五日傳下貴所之御本重移點了。……(3)

此卷同樣也經過了前後三次的校勘。然而比較特殊的是，此卷之底本由於當初平安初期舊鈔本的脫落，(1)貞永二年(1233)鈔寫時所使用的底本便是“摺本”(應與前“唐本”屬於同一系統本)。由於貞永二年所用的底本存在着嚴重的脫字漏字現象，因此(2)寬元五年(1247)又借閱了“菅大府卿爲長本”(參圖6)，對原文脫漏地方進行了補寫。建長四年用別本進行了再次校對。要之，與上文所提到的卷十四剛好相反，卷五十四是先據宋本書寫，後根據京都菅原家所持唐鈔系統本校補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同爲金澤文庫本的《白氏文集》各個卷軸，也各有異同，不可一概論之。